

# 东亚的笔谈研究

DONGYA DE BITAN YANJIU

王勇◎主编 谢咏◎副主编

东亚研究丛书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东亚笔谈文献整理与研究”成果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东亚研究丛书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东亚笔谈文献整理与研究”成果

# 亚的笔谈研究

NGYA DE BITAN YANJIU

王勇◎主编 谢咏◎副主编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的笔谈研究 / 王勇主编. —杭州: 浙江工商  
大学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7-5178-1066-7

I. ①东… II. ①王… III. ①笔记—研究—东亚  
IV. ①G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0138 号

东亚的笔谈研究

王勇主编

责任编辑 姚媛

封面设计 王好迪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恒力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6

字数 277 千

版印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78-1066-7

定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 总序: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东亚学”

2013年10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指出“我国周边国家外交的战略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通过走“共同发展”的道路,“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在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中,与东亚其他国家建立良好外交关系无疑是重中之重。因此,开展东亚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战略意义。

## 1. 东亚世界拥有共同的文化基础

数千年来,中华文明持续惠及周边诸国,约在隋唐时期就形成了东亚文化圈。以汉字为媒介的儒、释二教,典章制度,科学技术,乃至文物器皿、风俗习惯等,辐射、融合至周边各国,营造出一个“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和谐汉文化世界。这是我们共同的遗产,共同的文化基础。时至今日,东亚其他国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依然充满敬意。因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促进东亚共同繁荣,传统文化是个不可替代的历史基础,有必要加强历史文化研究之力度。

## 2. 东亚共同繁荣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和谐的东亚文化圈,曾促进区域文明长期繁荣;然而近代以来,它在西方势力的介入下日渐式微。目前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区域内多国合作形成某些联盟成为世界发展趋势,东亚散沙一盘已不合时宜,这也导致东亚的中、日、韩三国在与东盟的合作过程中出现“小马拉大车”现象。东亚各国在文化上拥有共同遗产,在经济上优势互补且利益相关,实现“共同发展”的“中国梦”,不仅具有坚实基础,而且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为了在学术理念、愿景擘画中争取更大的话语权,我们有必要追溯古代东亚文化圈的形成机制,剖析近代东亚文化圈的解体原因,预测未来东亚发展模式。

## 3. 将东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已成学术界共识

在学术研究领域,从传统的国别研究(点),过渡到比较研究或交流研究(线),

再发展到区域研究(面),已成为国际上学术发展的大势。综观欧美诸国名校与科研机构,多将东亚视作一个整体加以研究,设立诸如东亚系、东亚研究所、东亚研究院等。再看周边国家,日本学者最早提出“东亚册封体系”“东亚贸易圈”等学术概念,2008年关西大学首创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东亚文化交涉学”国家基地;韩国方面也奋起直追,冠名“东亚”的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创立,2009年韩裔财团出巨资在日本创立“One Asia Foundation”,迄今已在16个国家和地区的106所大学开办“亚洲一体化”讲座。因此,将东亚诸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已迫在眉睫,是与世界接轨和对话的必然途径。

#### 4. 具有中国特色的“东亚学”

从总体上说,历史相对悠久的西方的东亚研究,受制于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价值观,由旁观者操控而被边缘化甚至妖魔化;方兴未艾的日本、韩国的东亚研究,多少带着民族主义色彩,围绕东亚传统文化的起源与归属发生诸多争议;至于国内的东亚研究,往往排除中国本身,逐渐演化成一种域外研究,偏离国际东亚研究的主流。

2014年4月,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被批准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明确提出建构以中国文化为源头、以中国利益为核心的“东亚学”宗旨。本丛书秉承这一宗旨,推出东亚专题研究的一系列新成果,以就教于国内外方家。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首席专家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院长

王 勇

2014年10月1日

# 目 录

## 【东亚笔谈】

- 笔谈文献之种类····· 王 勇( 3 )
- 汉文笔谈之我见····· 李 庆( 12 )
- 前近代东亚海域的笔谈形态····· 松浦章( 19 )
- 三岛中洲的笔谈录三种····· 町泉寿郎( 33 )

## 【中日笔谈】

- 宋代来华日僧笔谈述略····· 华雪梅( 61 )
- 明代中日文人笔谈之研究····· 陈小法( 71 )
- 晚清陈荣昌与日本人士的诗歌交流····· 陈友康( 82 )
- 何如璋驻日使团与日本文人唱和考论····· 陈占锋( 101 )
- 清末中日官绅交往与《芝山一笑》····· 关 静( 120 )
- 《漂客纪事》中的漂流民笔谈研究····· 李晨楠( 130 )

## 【中朝笔谈】

- 朝鲜燕行使笔谈文献概述····· 王 勇( 149 )
- 《答朝鲜医问》与《医学疑问》渊源考····· 朱子昊( 158 )
- 《干净笔谈》中的异样关注····· 苏扬剑( 165 )

朴世堂《西溪燕录》初探……………朱俞默(176)

### 【日朝笔谈】

朝鲜通信使交流中的医学笔谈

——以日本内阁文库为核心……………梁永宣 李敏(1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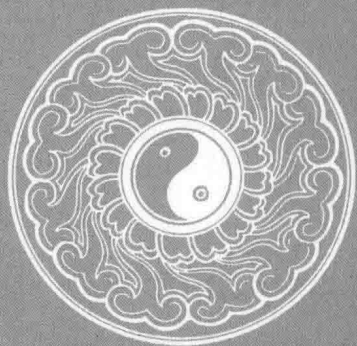
藤原惺窝与朝鲜俘虏的笔谈……………田村航(201)

新井白石与朝鲜通信使的笔谈二则……………孙文(217)

附录……………(240)

后记……………(247)





**第一部分**  
**东亚笔谈**





# 笔谈文献之种类<sup>\*</sup>

王 勇

(中国 浙江工商大学)

1543年,一艘从暹罗起航赴华的葡萄牙商船,在宁波遇风漂至日本种子岛。面对这批手持鸟铳、“其形不类、其语不通”的不速之客,岛民高度警戒,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同船的“大明儒生”五峰居中调停。可惜语言不通,于是岛主“以杖书于沙上云:‘船中之客,不知何国人也?何其形之异哉!’五峰即书云:‘此是西南蛮种之贾胡也。’”

这次依靠书写汉字进行的沙滩交涉,避免了一场一触即发的争端,岛民从葡萄牙人那里学习鸟铳制作方法,随后大量仿制并运用于实战,加速了群雄割据的战国时期的统一,这不仅在日本历史上揭开跨时代的一页,而且在东西方交涉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千余字的沙滩笔谈记录,全文收录在《铁炮记》(1606)中,这便是我们所要研究的“笔谈”。

然而,此类实录语言交际的“笔谈”,在中国传统的文体分类中未占一席之地,用西方的语言学理论也难以诠释其意蕴,所以有必要先为之别类定义。

## 一、笔记类“笔谈”

《辞海》收录此词,并给出两个义项:“(1)笔记一类的著作。宋沈括有《梦溪笔谈》。(2)用文字代替谈话发表意见。”<sup>②</sup>

先看第一个义项。所谓“笔记”,是中国传统文体之一种,泛指不拘题材格式、

<sup>\*</sup> [基金项目]本文为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东亚笔谈文献研究(中日编)”(课题号:14JDDY01Z)阶段性成果。

<sup>②</sup>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缩印本版,第1877页。

自由论述评议的散文,内容多为博采见闻、辨识名物、议论时事、摭拾逸文、叙述史事、写情状物之类,其异名《辞海》列出“随笔、笔谈、杂识、札记”几项,还可加上笔话、漫录、笔语、笔麈、笔录、杂记等。

此类文体之“笔谈”,以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包括《补笔谈》《续笔谈》)为其嚆矢,后起模仿者甚多,如明代有张大复《闻雁斋笔谈》《梅花草堂笔谈》、陆树声《清暑笔谈》、黄淳耀《山左笔谈》,清朝有阮元《定香亭笔谈》、俞樾《湖楼笔谈》、姜绍书《韵石斋笔谈》、陈均《画眉笔谈》、史梦兰《止园笔谈》、盛百二《袖堂笔谈》、龚炜《巢林笔谈》、许仲元《三异笔谈》等。

冠名“笔谈”的著作,还可分为两类。一是对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记录,与“笔记”无异;另一类是谈话的记录,如《宋史·沈括传》:“括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又纪平日与宾客言者为《笔谈》,多载朝廷故实、耆旧出处,传于世。”<sup>①</sup>故谓之“笔谈”名副其实。

随着中国文化传播四邻,日本、朝鲜的文人也仿其体裁,创作“笔谈”类著作。如朝鲜王朝时期,徐有英所著《锦溪笔谈》(亦称《左海逸史》),系作者从平安南道江东的流放地获释,回到故乡锦山,根据所闻所见编写的140余个故事。再如日本丰鸣丰洲的《丰子笔谈》(亦作《笔谈》),成书于安永七年(1778),作者自述云:“近兹谬为二三冠童所推长,质问不措。予既倦谈论,不欲口述,乃强笔一二所执以授焉。”也是以笔代舌,与《梦溪笔谈》异曲同工。

上述笔记类的“笔谈”著作,虽然有些具有“谈”的背景,但毕竟不是谈话的实录,与我们所要研究的“笔谈”风马牛不相及。

## 二、散文类“笔谈”

再看《辞海》的第二个义项,即“用文字代替谈话发表意见”。关于这个义项,阎景翰等主编的《写作艺术大辞典》(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认为其等同于“问题讨论”,即围绕某一主题,邀请多人执笔评议。

时下主流报刊确实多开设有形形色色的“笔谈”栏目,举例说,《人民日报》有“名家笔谈”,《文汇报》有“核心价值观笔谈”,《光明日报》有“书记笔谈”,等等。

<sup>①</sup> 沈括在《梦溪笔谈·自序》中也说:“予退处林下,深居绝过从。思平日与客言者,时纪一事于笔,则若有所晤言,萧然移日,所与谈者,唯笔砚而已,谓之《笔谈》。”

这些“笔谈”栏目除了均邀约多名官员或学者发表书面意见外，未必有明显的共性。如《文汇报》的“核心价值观笔谈”，各家之言紧扣同一个主题；《光明日报》的“书记笔谈”，作者的头衔限于“书记”，话题则各有所好；《人民日报》的“名家笔谈”，作者的身份略微宽泛，但诸人各擅其长，吴建民谈《用法治擦亮美丽中国》，王蒙谈《涵养时代的“文化定力”》，傅莹谈《不同视域下的中国》，刘亚洲谈《坚守神圣的“党性”》，等等，看不出与通常的栏目有多大区别。

此类“笔谈”栏目，并非时人新创。1941年9月1日，在香港创刊的一个文学半月刊杂志，由茅盾出任主编，“香港笔谈社”发行，刊名就叫《笔谈》。该刊自1941年12月1日首发，出至第7期即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停刊。据其征稿简介显示，刊物定性为“文艺性的综合刊物”。1981年上海书店出版了《笔谈》合订本，翻看内容多为散文小品，夹杂诗歌、小说甚至译作，与同类文学刊物大同小异。

综上所述，这个义项的“笔谈”，其实就是随笔、札记、时评、杂文等的时髦别称，与“口谈”“谈话”之“谈”无所关联，与本书所要讨论的“笔谈”亦相去甚远，自当排除在外。

### 三、书信类“笔谈”

《辞海》给出的两个义项皆与本文主题不符，且看第三个义项。任超奇主编的《新华汉语词典》（崇文书局，2006）为词条增加的义项为“彼此用文字交换意见，代替谈话”。

这类“笔谈”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邓治凡等主编的《汉语同韵大词典》（崇文书局，2010）将其限定为：“两人用书信的方式交换意见，代替谈话。”在西方人眼里，东亚人大抵不善言辞，而习惯用书写方式通事、谈论、诉情。明朝时来华的西儒利玛窦，根据自身观察得出结论：

就是现在，他们的辩才也只见于他们的写作而不在于口语……结果有时候甚至是住在同一城市而且离得很近的朋友，也是书信往返，而不见面谈话。<sup>①</sup>

<sup>①</sup> [意]利玛窦著，何高济等译：《关于中国人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及学位的运用》，选自《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一卷第五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页。

尺素往来,东西皆然。以“两地书”为例,中国人首先会想到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收录两人1925年3月至1929年6月间的135封信件,由鲁迅亲自编辑修改而成,分为三辑,1933年4月由上海青光书局出版。

2012年10月,重庆出版社发行了同名作品《两地书》,但作者却是两位美国人——露安妮·莱丝与约瑟夫·蒙宁格。书中的男女主人公萨姆与哈德丽感情上频亮红灯,此时维系他们夫妻关系的独子在阿拉斯加意外丧生,于是两人分道扬镳,萨姆西行去阿拉斯加探查儿子丧命原因,哈德丽东行去缅因州试图重拾画笔。他们分处美国东西两端,由于通讯不便,开始用纸笔给对方写信,共同寻觅最初相爱的那些理由。

两部同名的《两地书》,究竟有何区别?首先,美国的《两地书》是《纽约时报》两位畅销书作家虚构的文学作品,而中国的《两地书》却是真人实事;其次,美国的《两地书》是夫妻俩天各一方无法面晤才以书信沟通,而中国的《两地书》非因空间阻隔产生,第一辑共有30余封信件,两人均在北京且每周有一次课堂见面机会,但依然舍口谈而取笔谈,证实利玛窦之观察无误。

这类“笔谈”缺失现场,书信的语言也有其特殊的规范,归入传统的“尺牍”即可,不必另立“笔谈”门类做专门研究。

#### 四、隐秘性“笔谈”

前述《辞海》给出的第二个义项“用文字代替谈话发表意见”,徐复等主编的《古代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表述为“以文字交换意见或发表意见”,并举《儿女英雄传》第十六回为例:“如今我们拿分纸墨笔砚来,大家作个笔谈。”

这似乎具备了对面交谈的现场,只是以笔墨代替口舌罢了。然而,疑窦难以排遣:小说里的人物都能说会道,为何还会出现此种状况呢?清人文康创作的小说《儿女英雄传》共四十回,第十六回的标题为《莽撞人低首求筹画 连环计深心作笔谈》,兹摘录相应段落如下:

邓九公道:“老弟,我说句外话,你莫要镑张了罢?”老爷道:“不然。这其中有个原故,等我把原故说明白,大家自然见信了。但是这事不是三句五句话了事的,再也‘定法不是法’,我们今日须得先排演一番。但是这事却要作得机密,虽说你这里没外人,万一这些小孩子出去,不知轻重,露

个一半句，那姑娘又神道，倘被他预先知觉了，于事大为无益。如今我们拿分纸笔墨砚来，大家作个笔谈。——只不知姑奶奶可识字不识？”褚一官道：“他认得字，字儿比我深，还写得上来呢。”老爷道：“这尤其巧了。”说着，褚一官便起身去取纸笔。

原来众人为了“这事却要作得机密”，故以“笔谈”密议，提防隔墙有耳，孩子们“不知轻重，露个一半句”。中国人之间的这种“笔谈”，无非是偶然之举、应急之措，怪不得紧接上文，有一段说书人的道白：

列公，趁他取纸的这个当儿，说书的打个岔。你看这十三妹，从第四回书就出了头，无名无姓，直到第八回，他才自己说了句人称他作十三妹，究竟也不知他姓甚名谁，甚么来历。这书演到第十六回了，好容易盼到安老爷知道他的根底，这可要听听他的姓名了，又出了这等一个西洋法子，要闹甚么笔谈，岂不惹听书的心烦性躁么？

既然是“西洋法子”，就不是中国固有的，也不会是东亚传统的。加之此类“笔谈”属于偶发事件，如2011年10月28日中国台湾地区《联合报》刊发独家报道《张学良口述历史首次曝光》，郭冠英问：“谈谈您四弟张学思，他是不是在溪口书房中与您笔谈？”张学良答：

是这样的，那时我四面都有人（监视），我们也没谈什么正经事。他写说他是共产党，我看书，他说你不要看那些书，那不是正经书（意思是要看马列）。那时候他很厉害的，他说他在军校就是共产党，国民党怎能不败呢？内部好多人都投了共产党。他本来毕业的时候我推荐他去胡宗南那边，他没去，就跑到东北军去了，在东北军中鼓动得很厉害。东北军后来投去共产党那边很多，最厉害的就是吕正操。

显然这只是一种临时的规避措施，交谈不会长时间持续；又因为事属机密，当事人一般不保留笔谈原稿。这类“笔谈”虽然有其价值，但存世文献少之又少，不足以进行专题研究。

## 五、病残者“笔谈”

清人徐珂所编《清稗类钞》讲到“汪穰卿好客”时,说他“好客之名既著,故四方人士无不求与一面。日本人之能作华语者,亦与相周旋,某且举其家藏之宝刀以为赠”;接着笔锋一转,说“穰卿有弟曰仲阁者,则反是,以耳聋,须与人笔谈,人恒厌之故也”。

“汪穰卿”即汪康年(1860—1911),浙江钱塘人,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中日甲午战争后倡言变法图强,1896年创立《时务报》,延请梁启超任主编;1898年创办《时务日报》(旋易名为《中外日报》),以记载中外大事。汪康年思想开明,人脉甚广,谈锋亦健;其弟身有残疾,有口难言,靠笔谈达意。两相比较,优劣立分。

1949年,在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蒋介石携残部逃往台湾,10月31日寿诞他选择到阿里山“避寿”,次月从阿里山返台北途中,特意到台中看望陈果夫。“这时陈果夫肺病已至晚期,始终吐血,不能说话。于是,改为笔谈。”<sup>①</sup>沉痾在身的陈果夫,口不能言,“笔谈”乃不得已之策。

现代国内外的聋哑人学校,多开设“笔谈”课程,毕竟社会上懂得手语之人寥寥无几,于是“笔谈”成为他们与外界交际的重要方式。

总之,此类型的“笔谈”限于特定人群使用,或身患特殊疾病之人偶尔为之,内容多为短暂的应急交际语言,既不具有普遍性,文献价值也不高,故也排除在外。

## 六、跨方言“笔谈”

中国幅员辽阔,由于自然环境与历史沿革,造成方言林立的局面。一般而言,汉语有所谓的“八大方言区”,即北方方言区、吴方言区、闽北方言区、闽南方言区、粤方言区、湘方言区、赣方言区、客家方言区。

这只是语言学上的分类,放到实际生活中,方言何止百千种。比如吴方言区,包括浙江与江苏部分地区,且不说扬州人与绍兴人是否语言相通,杭州与绍兴虽然毗邻,但杭州人听绍兴话非常吃力,更不用说温州话、义乌话了。于是,“笔谈”成为各方言区相互沟通的桥梁。

蒋介石出生在浙江宁波的奉化县(今奉化市),一口乡音极重。曾有人在互联

<sup>①</sup> 王学庆:《蒋介石和陈立夫、陈果夫》,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



网发问：他追随孙中山多年，两人用何种语言交谈？广东中山话与宁波奉化话显然无法沟通，一种可能是用日语，另一种可能是“笔谈”。这虽然仅仅是网友们的猜测，但蒋介石确实曾以“笔谈”方式与同胞沟通。

据香港报人邱立本介绍，“蒋介石的浙江宁波话，也常有难‘言’之隐，当他遇上了哈佛大学和柏林大学毕业的‘国防部长’俞大维的湖南腔，也是无法沟通，只好‘笔谈’军机大事”<sup>①</sup>。

俞大维(1897—1993)是浙江绍兴人而非湖南人。蒋介石与俞大维同为浙江人，但奉化话与绍兴话却难以沟通。

这类“笔谈”中也有比较珍贵的史料。1907年6月，台湾爱国士绅林献堂赴日请教梁启超，“因一是广东人，一是闽南人，言语不通，无法畅谈，便改用笔谈”。梁启超书云：“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谅有同情。”<sup>②</sup>据当事者之一、陪同林献堂会谈的甘得中回忆，临别时林献堂“特请任公将当日笔谈之稿底携回……任公点首称善”<sup>③</sup>。

在普通话大面积传播之前，中国境内方言林立，相互之间无法以语音交际，汉字成了唯一可以跨越方言障碍的视觉语言。

## 七、周作人论“笔谈”

即使在全国推行普通话之初，带有各地乡音的所谓“蓝青官话”也不容易听懂。20世纪50年代初，周作人写过一组谈论汉字、汉语的散文，结为《十山笔谈》，首篇《笔谈的意思》开宗明义：

近来想写几篇小文章，不一定相连，却也并不一定不相连，因此要给他取一个总名，这叫作什么好呢？……我所写的文章在内容上不容易用一个名称包括，但目的原只有一个，就是同读者诸位谈谈，因为中间地隔千百里，天南地北，即使现在有了无线电，声音可以传达，可是我们的蓝青官话也使用不得，还是凭了这一枝秃笔，写出来印在纸上，更为可靠，这样说来正是十足地道的笔谈，那么这个总题目也可算是适合的了。<sup>④</sup>

① 邱立本：《保卫广州话超越鸡鸭之争》(<http://qiuliben.blog.ifeng.com/article/6652611.html>)。

② 武燕军：《林献堂传略》，《民国档案》1991年第1期。

③ 许俊雅：《未刊〈梁启超与林献堂往来书札〉中的几个问题》，《复旦学报》2007年第2期。

④ 周作人：《十山笔谈》，《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3期。

周作人强调要与读者“谈谈”，但因“地隔千百里”，对面交谈不成；又因“蓝青官话”乡音太重，利用“无线电”也未必能顺畅沟通，于是决定把要说的话笔录下来，11篇散文统名为“笔谈”（“十山”是其号）。

这11篇散文与周作人其他散文的语言风格相比，口语味极重，突出一个“谈”字。紧接着第二篇《谈汉字》，继续议论“笔谈”：

平常写信称作“如面谈”，一般写文章发表在报纸上，都可以算作笔谈，不过这里我想只是狭义的应用于我们自己，至少在外国是不能适用的。因为在我们中国这笔谈有一种特殊性，如从反面的来说明最容易明白便是，这并不像别的外国文，先要彼此懂得这话语，随后读文听音，可以明了里边的意思，却是使得方言各别对面说话，读出一个字的音来不能相通的人，看了文字能够懂得，这在世界上可以说是只此一家，并无分出的。

周作人指出“在我们中国这笔谈有一种特殊性”，即外国的文章必须先懂得语音含义，才能看明白文章；中国的情况即使彼此听不懂乡音，但通过视觉文字也可相互沟通。

周作人所说的“笔谈”，已经不仅仅是“笔记”“散文”之类的别称，似乎有意创造一种风格独特、接近口谈的新文体。然而，他强调“这在世界上可以说是只此一家”，则未必正确。

## 八、跨语言“笔谈”

《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对“笔谈”给出两个义项：（1）笔记类著作体裁之一种；（2）谓书面谈话。第一个义项举例《梦溪笔谈》，已如前述；第二个义项有三个用例：

①清王韬《瓮牖余谈·新金山少水》：“（日本官商）遍游内地，与名公卿大夫交，笔谈往复。”

②《儿女英雄传》第十六回：“如今我们拿分纸墨笔砚来，大家作个笔谈。”

③柳亚子《八日迭和左海少年四绝句》：“王孙天国喜能谙，豹隐鸿冥拟笔谈。”

如同前述，《儿女英雄传》的“笔谈”，是为了“这事却要作得机密”采取的防范措施